

刘田夫——抗日诛顽的中区特委书记

刘田夫（1907—2002），又名刘铁山，四川省广安人，1934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共青团，1937年入党后受派参加国民党张发奎部队，次年任中共第八集团军特别支部书记，1939年1月随队下广东，8月任中共西江特委书记，次年8月任中区（当时的中区主要包括珠江三角洲的中山、顺德、番禺、南海、三水等地区）特委书记。1943年9月任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4年10月任中区纵队政治部主任。1945年1月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部主任，10月兼任中区临时特委书记。1947年任两广纵队政治部主任。1949年底后历任广东南路地委书记、高雷地委书记、粤西区党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华南分局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1960年8月以后任中共广东省候补书记、副省长。1972年底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9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1981年任广东省省长，1983年任中顾委委员，是广东改革开放重要决策者之一。

1934年正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关头，为了追求真理，刘田夫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然而1935年12月，他在上海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始终坚贞不屈，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顽强斗争。1937年8月12日，日寇飞机轰炸上海，刘田夫被关押的北新泾和监狱遭到轰炸，监狱当局吓破了胆，急忙把羁押在监狱的政治犯编成了保安团，名义上是组织他们抗战，实际上是要借日寇之手致他们于死地。第二天，日寇大举进犯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刘田夫所在的保安团虽没有直接上前线作战，只是搬运弹药，但刘田夫心想也算是为抗日作出了贡献。8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田夫所在的保安团乘坐几辆大卡车向郊外撤退，汽车刚停，保安团便四处奔逃。刘田夫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在一个郑姓狱友的帮助下，回到了上海法租界，他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桎梏，回到党组织的怀抱。

1939年5月，刘田夫转到广东地方工作。在错综复杂和孤悬敌后的恶劣环境中，他为广东西江地区和中区地区党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和中山五桂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壮大，作出了积极贡献。

为了与敌人周旋，刘田夫经常出入危险的敌占区，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其中最值得称颂的就是他与志同道合的战友周敏玲假扮夫妻、假戏真唱，最后成为革命伉俪的故事。为了掩护机关工作，1939年，组织上让刘田夫与周敏玲以“夫妻”名义，开展革命工作。虽然同住一屋，他们仍保持纯洁的同志关系。一天深夜，国民党警察突查户口，发现刘周二人既为夫妻却分住楼上楼下，再加上刘的外地口音，不由起疑。周敏玲机智地应对说：“丈夫身患传染病，所以分开住”。次日早上，警察所又来人，对周敏玲查问，周从容淡定，应答如流，警察找不到破绽，只好作罢。

全面抗战以来，国共两党虽联合抗战，但国民党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反共。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反共逆流，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组织上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1940年8月，刘田夫调任中共中区特委书记。到任后，刘田夫迅速对中区各县委的领导人做了易地调整和调动，将一批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抗日武装骨干陆续调入新会沦陷区开展敌后工作。中共中区特委机关由城镇转入农村，特委领导成员则分散居住在乡村当地党员家中。

为了同中区各县联系，特委领导及党员们开店隐蔽，以老板、掌柜等各种职业作掩护。由于中区特委多层次开展活动，而活动的人员、地点则由特委领导同志单线分别联系，地方同志相互不认识、互不往来，有力保护了中区各级党的机构。

潜伏增加了抗战的难度，更考验着人的毅力，刘田夫克服了隐蔽斗争的种种艰难。1942年初夏，为了向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汇报工作，刘田夫从开平徒步去广州湾（今湛江）。当时正患疟疾的刘田夫，身体虚弱，面黄肌瘦。他打扮成小商人，跋山涉水，不畏艰险，步

行7天才抵达湛江。完成任务后，又步行回到开平。无论条件如何艰难、斗争形势如何凶险，刘田夫从来没有动摇和退缩，相反更加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和必胜的信心。

1942年初，中区特委机关迁到开平县下股乡高咀村，刘田夫居住于此，在当地建立了“白皮红心”政权，直接掩护特委领导开展活动。通过统战工作，团结、争取中间力量，集中力量打击顽固反动势力，逐步掌握全乡势力，建立“白皮红心”的乡政权。当时特委的几位负责人都化妆成水客行商，以做生意为名，来往各县。“三踏半”、“华丰米铺”、“源昌杂货店”、水井圩的“万隆客栈”等就是当时建立的联络站。正是刘田夫和中区特委领导的机智勇敢，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凭借在白区组建起来的联络站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证了中区抗战的胜利。

解放战争初期，刘田夫与曾生等率领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从1947年8月至1949年初，在第三野战军的指挥下，他和曾生等同志率领两广纵队参加了华东战场的豫东、济南和淮海等重要战役，出色完成了作战任务。1949年9月，他随两广纵队南下，参加了解放广东的战役，发挥了自已应有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刘田夫先后主持南路地委和粤西区党委的工作。他领导当地人民大力支持解放海南岛战役，并领导完成了军事接管、巩固政权、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渔区民主改革和农业合作化等各项任务。从1956年起他长期分管和主持广东省经济工作，为广东省的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刘田夫与省委其他负责人一起，领导全省人民完成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工作，增强了党和人民的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齐心协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发挥广东的人文地缘优势，敢想敢干敢闯，大胆实践，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他对广东的改革开放、经济特区的建立、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8年，宝安蛇口春潮涌动。这边，内地偷渡客前赴后继，只有发展才能阻遏；那边，香港产业转移，急需场地。1978年11月22日，国家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找到刘田夫，向他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运输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刘田夫和袁庚是老相识。解放战争时期，刘田夫任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袁庚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长，时有来往。刘田夫听了袁庚的介绍之后，感到十分振奋，觉得他们的构想很有胆识、很有气魄，和广东建立出口特区的设想不谋而合。

袁庚问：“在哪里搞？”刘田夫答：“就在宝安。”这一番话，引出了一夜间崛起的深圳，成就了袁庚“蛇口之父”美名。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深圳由一个不知名的小渔村崛起为世界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证明了党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也彰显了刘田夫对广东特区建设的不朽功勋。

刘田夫晚年仍不忘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职责，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作出了重大贡献。

“白区赤旅，抗日诛顽，工农文武，南北纵横，长留战绩光南粤。良师益友，宽仁厚德，日月风霜，公私坦荡，赢得丹心照汗青。”这是刘田夫逝世后，原广州市委书记欧初敬撰的挽联，概述了刘田夫青年时期在白区工作、坐过敌人监狱、为抗日打过游击、建立中山抗日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后搞过工业农业、为广东尤其是深圳珠海等特区建设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刘田夫是一位赢得了广东人民广泛尊重的好领导。